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 皖系军阀与日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 金汇海 周 颖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古 蓉

## 皖系军阀与日本（平装）

章伯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5 插页4 字数 289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0-002386-K·38 印数 1—750册

定价： 3.05元



## 前　　言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在清末把持和控制着清政府相当一部分政治、军事、经济大权，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局的政治势力，并乘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时机，窃取了中央政权，形成自1912年至1928年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的反动统治，最集中的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半封建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sup>①</sup>，在旧中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随着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其内部也逐渐的出现了不同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即是该集团中最大的两个山头。所以当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集团即开始发生分化，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从而得以控制北京政府，建立了皖系军阀的统治。

在研究和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原计划对北洋军阀的形成与发展单独写一章，以为本书的绪论，后鉴于已出版的有关专著中，对此已有详尽的论述，故而从略。现仅就中国近代湘淮军的出现与北洋军阀的历史渊源，谈些粗浅的看法，兼作为本书的引言。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页。（1966年横排本）。

北洋军阀起源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但它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成为当时政治上一股重要势力，绝非偶然。何以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发展形成为军事政治集团，而不是其他人所编练的新军（例如张之洞在南京也编练有自强军<sup>①</sup>）。在这方面，袁世凯练兵建军的指导思想，取法于曾国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洋军阀集团的出现，应该从曾国藩的湘军探索其历史成因。罗尔纲同志在《湘军兵志》一书中对“湘军兵为将有”有着精辟的论述，这些对我们研究和探讨北洋军阀与湘淮军的历史渊源，给予了很好的启示。

军队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工具。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是镇压人民维护阶级压迫的主要支柱。清王朝自1644年依靠“八旗”武装在全国建立了它的专制统治，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此期间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清政府的军制也不断有所演变，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兵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sup>②</sup>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清代兵制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是1840年鸦

<sup>①</sup>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编练自强军。

<sup>②</sup>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〇三，兵二，《光绪二十三年户部奏折》。

片战争以后，这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在太平天国等人民起义队伍面前，“绿营”到处崩溃，显然已不能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政府为挽救自己封建专制统治的危机，被迫不得不准许各省督办防军团练，加强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弥补“八旗”、“绿营”之不足。团练与绿营不同，它是勇丁来自招募，粮饷就地自筹的地方性地主武装，以后团练武装逐步演进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斗争起家的。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营官，下至哨长、兵士，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地主武装集团。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论及此事时说：“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选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sup>①</sup>后在1869年（同治八年），曾国藩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他明白的说出这种作法的反动意义：“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生枝生叶，皆一气可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时既有恩谊相受，临阵自能患难相顾。”<sup>②</sup>王定安在《湘军记》一书中，有关湘军营制，也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

① 《骆文忠公奏议》，卷一一，《援军将领滥收游军债事请旨革讯折》。

② 《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本），第一册《覆议直隶练军事宜折》。

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sup>①</sup>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清楚看出，湘军招募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由统领至什长兵士，系逐级由其顶头上司拣选招募，故上下一气贯通。因而形成兵弁只知有营哨官，营哨官但知有统领，而统领只对将帅负责，于是各营自成宗派，自成体系。湘军就是利用这种层层的封建纽带关系所形成的一支地主武装。湘军经由曾国藩一手经营培植，结果成为一支只有湘军系统的将领可以节制调遣，而非湘军系统却难以统率的军阀军队。清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sup>②</sup>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sup>③</sup>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点，却恰恰道破湘军的军阀宗派的性质。

中国近代军阀是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继之而起的是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从湘军脱胎而出的一支地主武装集团。湘、淮军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使清朝原有以八旗、绿营为基础的常制军队，逐步演变为以勇兵防军为基础的军队，而其主力是湘、淮军，从而改变了清代绿营常制军队的世兵制度。<sup>④</sup>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并本系军队的指挥权，而昏聩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也只好默认这些既成的事实。在

① 《湘军记》，卷二〇，《水陆营制篇》。

②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九册，光绪六年四月四日条。

③ 王闿运：《湘军志》，卷一五，《营制篇》。

④ 罗尔纲：《绿营兵志》对世兵制度考订颇详：绿营定制：守兵拔补，来源于“余丁”，“考余丁的制度，是将营中清出火粮收养兵丁子弟，每月给饷银五钱，以备出缺挑补，叫作‘余丁’，凡余丁到16岁就有资格考守兵。”即父兄在营，子弟为余丁，守兵缺出，即从余丁拔补，形成与征兵制、募兵制不同的“世兵制”。

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新军阀。它不同于中国旧军阀之处，就是因为它集官僚、买办、军阀三种性质于一体。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近代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具有更大的买办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是湘淮军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

## 二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反革命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对外执行妥协投降的外交方针，取得外国侵略者的信任。他恃此以自重，包办外交，权力极大，使其得以长期左右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正由于此，故当李鸿章病重时，欧美列强各国，就非常注意直隶总督的后继人选。如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清廷说：“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穆云：李相病颇重，……其大意愿袁抚到直隶而已。按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sup>①</sup> 中外反动派的信任和支持，为袁世凯在政治上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铺平了道路。他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其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一方面乘

<sup>①</sup>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四，第30页。

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在短短地几年里，犹如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后终于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最根本的一条，是牢固地控制着一支听命于他的北洋军，这也是袁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他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反革命治军方法。袁世凯所制定的《募练新兵章程》十九条，<sup>①</sup>即取法于湘军的招募办法。章程规定：各地方官按属均派，由地方保甲中保举确系土著乡民，系有家属，严禁招募“溃勇游民”。士兵入伍后，按月由饷银中扣银一两，半年一次，派员赴士兵原籍，配合地方官，发给士兵家属。每名士兵家属，准免差徭三十亩。潜逃者由地方官督饬庄长、地保并家属查拿。上述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招募入伍者只有死心塌地在营当兵，既使潜逃开小差，也势必牵及家属。这些都是曾国藩控制湘军，笼络士兵家属的手法，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袭用。加以“新建陆军”营饷均能按月发给，而各省防军勇丁，因饷源短绌，往往不能按月发给，或仅发六、七成。<sup>②</sup>对比之下，“新建陆军”待遇是较为优厚的。袁世凯就是利用这种招募制的雇佣性质，作为他控制士兵收买人心的手段。正如曾国藩在总结湘军招募制的意义时所说的：“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sup>③</sup>北洋军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培植训练的，故长期以来，使士兵和军官形成“其心理中不知有满廷，而唯知有项城耳”。<sup>④</sup>以至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得以利用这支武装，要胁清政府，对抗革命党人，达到他窃取政权的目的。

①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三，第1页。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一八，兵一七。

③ 《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一册，《覆议直隶练军事宜折》。

④ 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见《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3页。

另外，在袁世凯所制定的北洋《续备兵条例》<sup>①</sup>中规定：士兵退出常备军后，皆编为续备兵，并定期会操，“各兵所谋何业及寄居何处，迁移至某处者，皆须于十四日内稟明队官，分别转稟注册”；“各兵谋生不得投入他营，若聘为学堂外场教习，或他营官长者，须稟明核准，方可往就”。续备兵在三年之内，每月仍可领饷银一两，并在有续备兵百名以上的县内，由北洋各军直接派出官员负责管理等等。表面理由是学习西洋征兵制度之优点，寓兵于民，实际上在这些条文的后面，隐藏着袁世凯发展个人势力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把北洋军培植成为他的政治势力，就是退出现役的北洋士兵，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如《条例》中有续备兵“不得投入他营”的规定，这表明续备兵系专属于北洋军，而不属于国家，更不能为他省区所用。因此说，北洋军从其一开始建军，袁世凯就有意识的使这支军队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派性质。

曾国藩是办团练起家，终至形成湘军集团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有着一整套的反动经验。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统治王朝，对于汉族地主势力，向来深怀戒心，控制十分严密，而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却能培植湘军这样的地主武装，并发展为一大政治势力，的确为当时及其以后的一些官僚政客，提供了钻营仕途攫取权力的经验，更为一些政治野心家所继承。李鸿章的淮军集团，沿着曾国藩所开辟的这一途径，在清末形成一大势力。袁世凯正是继承了曾、李的衣钵，经营培植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

---

① 《北洋公牍类纂》，卷一二，兵政。

### 三

段祺瑞的皖系，只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一个派系，与他同时还有冯国璋直系及稍后的张作霖奉系。故段不能象袁世凯那样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绝对权威和首领。段祺瑞在清末历任北洋军第三、四、六镇统制，并一度短期出任江北提督；进入民国后，长期出任陆军总长。他的班底中的骨干核心人物，如号称皖系“四大金刚”的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也多是出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总次长或师长，而担任督军、省长的不多。与直系、奉系相比，皖系在各省区地方上缺乏实力基础，这就为皖系军阀统治政权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更何况段祺瑞继袁世凯死后出任国务总理时，所面临的是全国各省地方势力纷纷崛起，而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各方势力，鼎足而立，段祺瑞的实力，尚不足以号令全国。北京政府财政拮据，库贫如洗，各省应解交中央的款项，往往为地方省区所侵占把持，段对全国的控制是软弱无力的。这些，都是与袁世凯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的统治地位所无法比拟的。

段祺瑞上台之后，深感要想牢固地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没有雄厚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是难以稳定并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段执政之初，即在政治上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人，以对抗和打击国民党势力；在经济上依靠亲日的买办资产阶级新交通系，取得国内财政金融界的 support；在对外关系上勾结日本，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排除异己，扩大和发展皖系的实力；逐步建立了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政权。

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各派问鼎中央政权的角逐中，它们无一例外的都与帝国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这方面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几乎贯穿于皖系统治时期的全过程，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府院之争、张勋复辟、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矛盾、南北议和、巴黎和会，直至直皖战争，无不打有日皖勾结的烙印。皖系与日本的勾结，虽有种种的国际和国内的因素，但皖系的主动投靠，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忠实奴仆，应该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在段祺瑞皖系的班底中，核心骨干人物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sup>①</sup>，与皖系结成联盟的新交通系的重要成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也于清末留学日本<sup>②</sup>，而他们又是皖系的决策和智囊团，在皖系投靠和勾结日本的过程中，这些人起到桥梁和牵线的作用，在皖系统治时期，

<sup>①</sup> 徐树铮（1880—1925）1905年由段祺瑞保送日本学习军事，1908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毕业。民国初年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任军学司司长、陆军次长等职，1918年任参战军参谋长。

曲同丰（？—1937）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5年任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任参战军军士教导团团长，1919年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

傅良佐（？—1926）1904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1916年任陆军部次长，1917年8月一度任湖南督军，后任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

吴光新（1881—1939）段祺瑞妻弟。1904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1914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17年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sup>②</sup> 曹汝霖（1877—1966）1900年赴日留学，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1904年归国。1915年任外交部次长，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1917年任交通银行总理。在皖系统治时期长期担任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章宗祥（1879—1962）1899年赴日留学，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民国初年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1916年6月被段祺瑞任命为驻日公使。1919年因五四运动被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总理。

陆宗舆（1876—1941）1899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1902年毕业回国。1911年任交通银行协理，1913年至1916年6月任驻日公使，1918年任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总理。

凡与日本有关系的重大交涉，都与这帮人有着密切关系。段祺瑞对这些亲日派是言听计从，章宗祥在《东京之三年》中记载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之初，即是依靠阁员中所谓新派之金邦平、张国淦<sup>①</sup>、曹汝霖及章宗祥，“凡有新设施皆归四人协议而定”。<sup>②</sup>寺内正毅亲信西原龟三 1916 年 6 月首次来华进行活动（寺内于 1916 年 10 月任内阁总理大臣），最初所接触的中国政界要人，即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sup>③</sup>段祺瑞上台，立即于 1916 年 6 月底任命章宗祥为驻日公使，接替陆宗舆，负责对日外交，并对章表示将改变袁世凯的对日政策。<sup>④</sup>待日本寺内内阁成立，急欲拉拢段祺瑞皖系军阀以为己用。寺内、胜田、西原密议决定邀曹汝霖赴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sup>⑤</sup>日本首先与章宗祥密谈此事，章对此“也很感兴趣”，<sup>⑥</sup>遂将此信息传递给段祺瑞。自此以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的一系列对日重大问题，都是首先通过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居间连系和交涉的。

新交通系曹汝霖等，不仅以其所控制的交通银行，在财政、金融方面给予段祺瑞大力支持，同时以交通银行名义对日借款来帮助段内阁解脱财政危机。1917年1月20日所签订的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就是曹汝霖与西原龟三商妥后签订合同的，此即为“西原借款”的开端。以“西原借款”为例，共八项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几乎全部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一手包办并签订

① 金邦平(1892-?)清末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袁世凯文案、北洋督练处参议、资政院秘书长。1916年4月任段祺瑞内阁农商总长。

张国淦(1876—1962)清末任东三省交涉局总办。民国初年任国务院秘书长等职。段祺瑞统治时期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职。

<sup>②</sup> 《近代史资料》，总38号，章宗祥《东京之三年》。

<sup>③</sup> 《西原龟三日记》，第133页，1916年7月1日、4日日记。

④ 《近代史资料》，总38号，章宗祥：《东京之三年》。

<sup>⑥⑥</sup>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第125页。

合同的。段祺瑞对内对外一些重大决策，无不有新交通系曹、章、陆参与其事。新交通系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既充当段之智囊，又是皖系军阀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有力帮凶。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在这一方面，段祺瑞皖系政权具有非常鲜明的买办色彩。

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军阀、买办、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随着日皖勾结的日益密切，1917年7月20日日本寺内内阁通过援段的对华外交方针，在其内阁决议中说：“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亦予以相当友好之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时至今日之中日两国间若干悬案，实为得策。”<sup>①</sup> 所谓“悬案”，就是日本对华早已提出而未落实或尚未达到目的的侵略要求，要通过亲日的皖系军阀之手，一一兑现。日本的援助和支持，是以皖系的卖国为代价的。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给予中国的借款总额为日金386450000元，其中给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借款，即达日金279860000元。<sup>②</sup> 这些借款绝大部分都充作了段祺瑞发动内战的军费。日本通过借款，获得了包括铁路、森林、矿山、训练中国军队、霸占中国领土的种种侵略特权。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段祺瑞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而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所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437—438页。

②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4页。

以当它一旦失去外援，段祺瑞苦心经营多年的边防军及安福系御用政治组织，虽然一时貌似强大，但由于对内穷兵黩武，对外卖国求荣，民心丧尽，失道寡助，故当直皖爆发战争，皖系势力倾刻间土崩瓦解，迅速遭到失败，在北方政局中从此一蹶不振。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暂时得到奉系和国民军的支持出任执政府执政，而其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一个帮闲的配角，在政治上已不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是1916年至1920年段祺瑞统治时期这段历史中，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主要是着重于这一侧面，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进行一些探索和剖析。目前史学界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假如本书在这个方面能做出一点有益的贡献，将是作者莫大的荣幸。

# 目 录

前 言.....	1
<b>第一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与直皖系军阀的形成.....</b>	<b>1</b>
第一节 段祺瑞的身世与经历.....	1
第二节 洪宪帝制导致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	6
第三节 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	10
第四节 北方政局的风云变幻.....	14
<b>第二章 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b>	<b>22</b>
第一节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大隈内阁对华方针.....	22
一 大陆政策的形成.....	22
二 乘欧战之际大肆侵华.....	24
三 对袁世凯帝制所玩弄的手段.....	28
四 袁世凯死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34
第二节 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36
<b>第三章 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b>	<b>47</b>
第一节 段祺瑞与黎元洪、国民党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47
第二节 日皖勾结的开始.....	53
第三节 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反映的日美矛盾.....	58

<b>第四节 督军团与解散国会</b>	71
一 国会反对参战段祺瑞操纵督军团干政	71
二 日本支持皖系军阀阴谋解散国会驱黎下台	75
<b>第四章 张勋复辟</b>	80
第一节 复辟的远因	80
第二节 皖系军阀勾结利用复辟势力的阴谋	85
一 皖系唆使张勋复辟	85
二 日本对复辟的态度	89
第三节 顷刻覆灭的宣统复辟	93
一 复辟内幕	93
二 复辟闹剧的开场	99
第四节 在日本支持下段祺瑞重返北京执政	102
<b>第五章 日美签订蓝辛石井协定</b>	107
第一节 日美在华的争夺及其实质	107
第二节 美国对日本的暂时妥协	111
<b>第六章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与日本帝国主义</b>	117
第一节 寺内内阁的援段方针	117
第二节 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与护法运动的兴起	119
第三节 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北军进入湖南	123
<b>第七章 西原借款及其侵略实质</b>	123
第一节 西原借款的经济背景	129
第二节 西原借款的侵略实质	135
一 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	137
二 扩大和巩固日本在华侵略特权和势力范围	143
三 掠夺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产地	154
第三节 西原借款的用途	161